

死亡强迫及其评估工具的初步介绍

罗溪 李霞 邵阳

20003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硕士研究生(罗溪),老年科(李霞),医务科(邵阳)

通信作者:邵阳, Email: sawyer2002@vip.tom.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18.04.012

【摘要】 死亡强迫是一类以死亡为主题的强迫性思维,其评估工具为死亡强迫量表(Death Obsession Scale, DOS)。死亡强迫的影响因子分为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包括不同的地区和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个体因素分为个体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个体是悲观还是乐观以及性别因素。现对死亡强迫的概念、评估工具及影响因子做一综述。

【关键词】 死亡强迫; 环境; 个体; 评估工具; 综述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1310500)

Preliminary introduction to the tools of death obsession and its evaluation tool Luo Xi, Li Xia, Shao Yang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Luo X); Geriatric Department,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Li X); Medical Department,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Shao Y)

Corresponding author: Shao Yang, Email: sawyer2002@vip.tom.com

【Abstract】 Death obsession is a type of death-themed compulsive thinking, the assessment tool of which is the Death Obsession Scale (DOS). The impact factors of death obsession are divided in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factor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e the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local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dividual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whether individuals have religious beliefs, whether individuals are pessimistic or optimistic and gender facto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assessment too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ath obsession.

【Key words】 Death obsession; Environment; Individuals; Assessment tool; Review

Fund program: National Key R&D Plan (2017YFC1310500)

人类对于死亡的畏惧可谓是由来已久。虽然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但还是会引起个体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人类对于死亡的探索中,最早被提出的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1],死亡焦虑是个体对于与自身或重要他人相关的死亡或者临终相关事件体验到的不安、恐惧、害怕等情绪。之后,又有研究者提出了死亡抑郁(death depression)^[2]的概念,认为死亡抑郁是由关于自己濒死、重要他人濒死甚至死亡导致个体产生的抑郁情绪^[3]。死亡强迫(death obsession)与这两个概念同等地位但是目前受到关注较少,然而死亡强迫不仅是死亡带来的忧虑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自杀风险一个较好的预测指标^[4]。因此本文将通过介绍死亡强迫的概念,并总结前人研究结果,填补国内关于死亡强迫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一、基本概念

死亡强迫最早是埃及学者 Abdel-Khalek 在 1998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死亡和强迫之间存在一种相关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重叠,例如死亡可以成为强迫思维的一个主题”^[5]。Abdel-Khalek 将这种“重叠”提炼成死亡强迫的概念,并定义死亡强迫为“那些以自我或其他重要的人的死亡为中心的不断重复的想法或反刍性思维、持续的念头和图像,这些不仅是侵入性的,并且会引起明显的痛苦体验”^[5]。例如 de Silva 和 Rachman 曾经在书中报道过的一个案例,一名年轻女子的头脑中控制不住地出现他的丈夫在车祸中身亡的场景^[6]。这就是一例以身边重要他人的死亡为主题的强迫性思维。当这种强迫性思维发展到极端的情况则会成为以死亡为主题的强迫症。

现有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死亡强迫倾向与死亡焦虑、死亡抑郁倾向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而且这种关联高于死亡强迫同个体的一般强迫、焦虑、抑郁以及神经质倾向之间的关联^[5,7]。这说明死亡强迫与死亡焦虑、死亡抑郁三者虽然均是死亡相关的消极情绪,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作用,从属于同一概念框架,但是也各有侧重,是死亡带来的消极体验的不同方面。而死亡强迫虽然是一种强迫思维,但因其主题内容的独特性,也有别于一般的强迫倾向、情绪心理反应以及人格特点。国外研究发现接受和承诺疗法对于老年人死亡强迫症状的干预有显著的效果^[8]。

二、死亡强迫的评估

1. 评估工具: 1998年, Abdel-Khalek 编制了死亡强迫量表(Death Obsession Scale, DOS)^[5], DOS为自陈式量表,共有15个条目,使用5点(1~5)计分标准,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则代表死亡强迫越强,每个条目得分与总分均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39~0.81。编者使用斜交旋转的主轴因子法抽取出3个因子,分别为“死亡反刍性思维(death rumination)”“死亡控制(death domination)”和“重复的死亡观念(death idea repetition)”,每个因子包含的具体条目内容详见表1,其中第7和第14条目包含于两个因子内。在埃及被试中测得的男性、女性、全部被试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90、0.91和0.91,且间隔一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91、0.92和0.92,表明在埃及人群中, DOS具有高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背景,人们对于死亡主题往往采用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因此中外文化差异是否会导致死亡强迫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现有的量表能否准确测量国人真实的死亡强迫水平,仍需未来进一步研究影响中国人死亡强迫水平的因素,以期得到符合中国人需要的死亡强迫量表。

2. 在不同人群中的使用: 2000年,英国学者 Maltby 和 Day^[7]在英国大学生和成年人样本中分别施测了英文版DOS,在英文版DOS分析过程中,两个样本数据均提取了与阿拉伯文版本DOS一致的3个因子,并且分析结果出现了与预期相符合的DOS得分与死亡焦虑、死亡抑郁、强迫症状、焦虑症、抑郁症、神经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DOS在英国被试中仍然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

在此之后,研究者又选取了西班牙、科威特、美国、巴勒斯坦、伊朗和南非等地的样本,在这些被试群体中,仍发现DOS具有较高的信效度^[9-13]。在西班牙样本中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与阿拉伯文版本并不

表1 各因子所包含的具体条目

因子名称	所包含条目
死亡反刍性思维	3. 我没有办法消除脑海中关于死亡的意图 4. 对死亡的思考占据了 my 脑海 5. 我觉得很难摆脱死亡的念头 7. 我感觉自己不受控制地思考死亡 8. 死亡的想法困扰了我 9. 我曾过分关注死亡的想法 10. 我感觉自己急切地思考死亡 12. 我持续不断地思考死亡
死亡控制	1. 我脑海里总是冒出一些无法回答的关于死亡的问题 2. 我忍不住地认为我会早死 6. 我常想起死亡中令人恐惧和痛苦的一面 7. 我感觉自己不受控制地思考死亡 14. 反复出现的死亡的想法让我很烦 15. 我将会突然死亡的感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重复的死亡观念	11. 我害怕被死亡的想法所控制 13. 对死亡的思考使我很紧张 14. 反复出现的死亡的想法让我很烦

完全相同的3个因子。然而在科威特样本中得到单因子模型,该因子被直接命名为死亡强迫。在美国和伊朗样本中只提取出2个因子,被命名为死亡反刍性思维与死亡控制重复。在巴勒斯坦和南非的男性样本中,提取出与原版一致的3个因子,而女性中只提取出了1个因子。这些结果与先前的研究资料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 DOS的三因子结构只在4个样本中得到印证,即最早的埃及样本^[5]、英国大学生和成年人样本^[7]以及巴勒斯坦和南非男性样本^[11],在其他样本的因素分析中则产生了一些数量和意义都不同的因子。这可能是由于探索性因子分析这个方法自身原因,或是方便抽样的原因,也可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也有研究者提出通过DOS总分来解释被试的死亡强迫程度比从3个因子的维度来解释可能会更具效力^[10]。

3. 在不同患者中的使用: 2002年, Abdel-Khalek^[14]进一步搜集DOS在临床样本中的使用情况。临床组包括男性焦虑症组、女性焦虑症组、男性精神分裂症组、女性精神分裂症组和男性物质成瘾组,对照组包括健康男性组和健康女性组,这7个组的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发现在临床样本中,首先DOS具有高的内部一致性,其次女性和男性焦虑症患者在DOS上的平均得分都显著高于其他组,可能的原因是DOS得分与个体的神经质这一人格特质是相关联的。焦虑症患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神经质水平,而研究表明焦虑症患者同时也具

有最高的DOS均分。而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得分与健康男性组之间并未出现明显差异,男性焦虑症患者的DOS均分却几乎是前两组的2倍。

三、死亡强迫的影响因素

1. 环境因素: (1) 地区: 研究发现4个阿拉伯国家的被试, 包括埃及、科威特、黎巴嫩和叙利亚, 其DOS得分均显著高于西方国家(英国、美国和西班牙), 这种差异曾被理解是由于西方国家更偏向于个人主义, 而阿拉伯国家更多为集体主义^[15],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两个地区在生活质量、宗教信仰和对死亡的理解即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而导致的^[16]。(2) 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对于个体死亡强迫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 这可能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关。2003年, Abdel-Khalek与Lester^[9]研究发现, 科威特被试在DOS的得分上显著高于美国被试。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 科威特人民相较于美国人民, 遭受更多持久存在的死亡威胁, 这也造成他们对死亡更多的负面想法, 包括以死亡为主题的强迫性思维, 即死亡强迫。Shakila和Yousaf^[17]研究发现, 生活在政治不稳定环境下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地区的被试也具有更高的死亡强迫水平。这说明持续存在的暴力环境会给个体带来很大的压力, 从而导致更多死亡强迫。为了验证生活在不稳定政治环境中的人群具有更高的死亡强迫, 2006年, Abdel-Khalek等^[11]对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死亡强迫程度进行研究。巴勒斯坦人民生活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之下, 正在遭受连续战争的不利影响, 因此研究者认为他们应该会有高度的死亡强迫。然而研究发现虽然巴勒斯坦被试DOS得分虽高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被试, 但是却显著低于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黎巴嫩这4个阿拉伯国家的被试。这可能由于巴勒斯坦人自从1967年开始, 便一直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 他们已经慢慢适应了冲突和暴力, 因此长期的残酷战争反而降低了个体的死亡强迫水平。不稳定环境对于个体死亡强迫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

2. 个人因素: (1) 个体的宗教信仰: 任何宗教都对死亡这一命题有自己的理解, 而有宗教信仰的个体也更倾向于用宗教中对死亡的解释来看待死亡和自己的生命, 因此个体是否具有宗教信仰及具有信仰何种宗教也会使得个体对死亡的态度有所不同。Maltby和Day^[18]发现在信仰基督教的英国大学生样本中, 有较为坚定的宗教信仰的被试在DOS上得分显著更低。可能的解释是, 基督教认为死亡并非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 因此信仰基督教的被试也就更少引发关于死亡的强迫性思维。在一项被试群体为

埃及护理专业的女大学生的研究中, 发现是否信仰伊斯兰教和死亡强迫并无显著相关关系^[19]。这可能由于两项研究中被试属于不同的宗教派别, 也有可能是被试选取的问题, 在埃及的这项研究中, 被试的来源与单一, 都是护理专业的女大学生, 也许护理专业的学生对死亡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中国, 个体的宗教信仰对死亡强迫的影响尚未被研究。中国民众虽长期受到儒释道文化影响, 但近现代国人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因此真正具有宗教信仰者并不多, 因此在中国宗教带来的影响或许会更小。在未来的研究中, 对不同派别的宗教和不同的信仰程度对个体的死亡强迫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2) 性别: 以往研究关于死亡强迫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有许多不一样的结果, 在科威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样本中, 女性的DOS得分显著高于男性, 在叙利亚、埃及、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样本中, 这种差异却并不显著^[9, 11, 20-21]。总的来说, 阿拉伯文化背景的地区, 男女死亡强迫的差异较西方文化背景国家来说会更大一些。这可能由于在科威特、黎巴嫩、巴勒斯坦这几个地区性别歧视的情况更加严重, 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 能力发展、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等均低于男性, 更难发展出自我独立健全的人格, 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许导致女性死亡强迫更严重。因此, 性别本身或许并不导致直接对个体的死亡强迫产生影响, 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待两性的态度却会对个体的死亡强迫造成影响。(3) 直接经验: 为了探索死亡相关的直接经验是否会个体死亡强迫产生影响, Dadfar和Lester^[22]对比了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的护理人员与该大学里的工作人员之间死亡强迫的差别, 结果发现两组间死亡强迫得分并无显著差别。即护理人员丰富的与死亡直接相关的经验并没有让他们的死亡强迫与其他工作人员有所区别, 但是作者认为医科大学中的工作人员也较多接触生病和垂死的患者, 因此需要设置一个完全与医护行业无关的对照组来进一步探索与死亡相关的直接经验对于死亡强迫的影响。(4) 乐观/悲观: 有研究发现, 乐观主义的个体较悲观主义的个体死亡强迫水平明显更低^[23-24]。可能的原因是, 这两种思维倾向都包含了个体的人格气质类型与对未来的预期, 人格气质和对未来的预期又是我们理解死亡强迫背后的认知过程关键因素, 一个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人, 会更少受到死亡强迫的侵扰。

四、小结

目前, 关于死亡强迫这个领域的研究资料仍较少,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死亡强迫的表现往往是与死亡焦虑、死亡抑郁等相伴出现的, 研究者可能会认

为个体反复思考死亡是由于其焦虑、抑郁的情绪所致,因此并未严格鉴别、区分死亡强迫与死亡焦虑、死亡抑郁。然而死亡强迫与死亡焦虑或死亡抑郁并不等同,且有其独特的研究意义。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摆脱死亡恐惧和寻找永生可能仍是宗教信仰的重要驱动力,对死亡强迫的研究可以为心理学领域中这类现象提供新的视角。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老龄化进展加快,因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日益引起关注。而老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死亡。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由于老化或者疾病,死亡的逼近会引起很强的负面体验,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重压之下的一种表现就是死亡强迫,他们强迫性的反复思考与死亡有关的事情,不仅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更进一步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我们需要去理解何为死亡强迫,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针对这种消极体验进行心理辅导或心理干预,从而为老年人顺利老龄化打下基础。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对DOS进行汉化并考察在其信效度,其次需要调查死亡强迫在中国被试中的总体水平,并研究在中国上述的影响因子是否仍具效力。相信随着研究不断推进,我们将会更清楚死亡强迫在中国被试间的分布情况,为之后更好地进行干预做铺垫。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综述撰写为罗溪,课题构思为李霞,论文审校为邵阳

参 考 文 献

- [1] Lester D. Experimental and correlational studies of the fear of death[J]. *Psychol Bull*, 1967, 67(1): 27-36. DOI: 10.1037/h0024068.
- [2] Templer DI, Lavoie M, Chalgujian H,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death depression[J]. *J Clin Psychol*, 1990, 46(6): 834-839. DOI: 10.1002/1097-4679(199011)46: 6<834: : AID-JCLP2270460623>3.0.CO; 2-0.
- [3] Tomás-Sábado J, Limonero JT, Templer DI, et al. The death depression scale-revised. Preliminary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the Spanish form[J]. *OMEGA-J Death Dying*, 2005, 50(1): 43-52. DOI: 10.2190/XBRR-PMPP-COXH-KP80.
- [4] Abdel-Khalek A, Lester D. Can personality predict suicidality? A study in two cultures[J]. *Int J Soc Psychiatry*, 2002, 48(3): 231-239. DOI: 10.1177/002076402128783271.
- [5] Abdel-Khalek AM. The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death obsession[J]. *Person Individ Diff*, 1998, 24(2): 159-165. DOI: 10.1016/S0191-8869(97)00144-X.
- [6] De Silva P, Rachman S.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The Fact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5-116.
- [7] Maltby J, Day L.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Death Obsession Scale among English university and adult samples [J]. *Person Individ Diff*, 2000, 28(4): 695-700. DOI: 10.1016/S0191-8869(99)00131-2.
- [8] Bayati A, Abbasi P, Ziapour A,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on Death Anxiety and Death Obsession in the Elderly[J]. *Middle East J Fam Med*, 2017, 15(10): 122-128. DOI: 10.5742/MEWFM.2017.93148.
- [9] Abdel-Khalek AM, Lester D. Death obsession in Kuwaiti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Death Stud*, 2003, 27(6): 541-553. DOI: 10.1080/07481180302881.
- [10] Tomás-Sábado J, Gómez-Benito J.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panish adaptation of the Death Obsession Scale[J]. *OMEGA-J Death Dying*, 2003, 46(3): 263-272. DOI: 10.2190/4B2C-MK8J-X8YJ-9X4M.
- [11] Abdel-Khalek AM, Al-Arja NS, Abdalla T. Death obsession in Palestinians[J]. *Death Stud*, 2006, 30(3): 203-215. DOI: 10.1080/07481180500493302.
- [12] Rajabi 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Death Obsession Scale in Freshm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J]. *J Appl Sci*, 2009, 9(2): 360-365. DOI: 10.3923/jas.2009.360.365.
- [13] Mashegoane S, Makhubela MS. Factorial validity of the death obsession scale in Af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J]. *Death Stud*, 2016, 40(1): 40-45. DOI: 10.1080/07481187.2015.1056564.
- [14] Abdel-Khalek AM. Death obsession in Egyptian samples: differences among people with anxiety disorders, schizophrenia, addictions, and normals [J]. *Death Stud*, 2002, 26(5): 413-424. DOI: 10.1080/07481180290087384.
- [15] Abdel-Khalek AM. Death anxiety in Spain and five Arab countries[J]. *Psychol Rep*, 2003, 93(2): 527-528. DOI: 10.2466/pr0.2003.93.2.527.
- [16] Tomás-Sábado J, Gómez-Benito J. Death anxiety and death obsession in Spanish students[J]. *Percept Mot Skills*, 2004, 98(1): 31-34. DOI: 10.2466/pms.98.1.31-34.
- [17] Shakil Z, Yousaf T. Death Obsession and Rum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Muslim Young Adults[J]. *Soc Behav Sci*, 2015, 190: 202-206. DOI: 10.1016/j.sbspro.2015.04.935.
- [18] Maltby J, Day L.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death obsession [J]. *J Genet Psychol*, 2000, 161(1): 122-124. DOI: 10.1080/00221320009596699.
- [19] Al-Sabwah MN, Abdel-Khalek AM. Religiosity and death distress in Arabic college students[J]. *Death Stud*, 2006, 30(4): 365-375. DOI: 10.1080/07481180600553435.
- [20] Abdel-Khalek AM. Death obsession in Arabic and Western countries[J]. *Psychol Rep*, 2005, 97(1): 138-140. DOI: 10.2466/pr0.97.1.138-140.
- [21] Shakil Z, Yousaf T.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ath Obsession[J]. *Soc Behav Sci*, 2015, 185: 146-150. DOI: 10.1016/j.sbspro.2015.03.414.
- [22] Dadfar M, Lester D. Death Concern and death obsession in Iranian nurses[J]. *Psychol Rep*, 2015, 116(3): 704-709. DOI: 10.2466/12.13.PR0.116k30w5.
- [23] Abdel-Khalek A, Lester D.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Kuwaiti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Int J Soc Psychiatry*, 2006, 52(2): 110-126. DOI: 10.1177/0020764006062092.
- [24] Abdel-Khalek AM, Maltby J.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ors of death obsession within two cultures [J]. *Death Stud*, 2008, 32(4): 366-377. DOI: 10.1080/07481180801929053.

(收稿日期: 2017-09-29)

(本文编辑: 赵静姝)